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时代意蕴

钟茹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一重大部署,既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持续深化,更是立足“两个大局”、应对复杂变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考量。正确政绩观绝非抽象的道德宣示,而是具有鲜明时代内涵的实践命题。深刻把握这一学习教育的时代意蕴,对于引领各级领导干部在新征程上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发展转型的时代呼唤:从速度规模转向质量效益型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快不快”向“优不优”深刻转变的关键时期。过去某个时期,部分干部习惯于以GDP增长率论英雄,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追求短期政绩。这种政绩观在特定历史阶段有其作用,但弊端也日益显现:资源透支、生态恶化、债务累积、发展不可持续。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首要时代意蕴,就在于引导各级干部深刻

认识发展阶段的根本性变化。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要求政绩观必须从“速度情结”“规模崇拜”中解放出来,转向对发展质量、结构、效益、安全、可持续性的全面考量。学习教育本质上是一场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是从“唯GDP论”到“以人民为中心、以质量为导向”的范式转换。只有摒弃急功近利的“政绩冲动”,才能真正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二、价值坐标的时代校准: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

时代在变,但党的初心使命不变。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矛盾复杂交织的今天,少数干部政绩观出现偏差:有的热衷于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劳民伤财;有的脱离实际、盲目攀比,造“盆景”、刷“数据”;有的甚至为了个人升迁搞虚假政绩。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背离了“为了谁”这一根本价值坐标。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时代意蕴之二,就是重新校准政绩的价值指向——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

绩。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政绩的感受,不再是抽象的经济指标,而是具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学习教育要求干部把目光从“上级注意”转向“群众感受”,把工作重心从“材料好看”转向“群众叫好”。其时代意义,就在于推动领导干部真正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政绩写在人民心上。

三、风险应对的时代需要:强化底线思维与历史耐心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风险挑战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前所未有。在这种背景下,少数干部滋生了两种倾向:一种是“躺平”心态,为不出事宁可不干事;另一种是“冒进”心态,为求“亮点”不惜铤而走险、寅吃卯粮。两种倾向都是政绩观扭曲的表现。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时代意蕴之三,在于培养干部的科学精神、底线思维和历史耐心。正确政绩观

强调按规律办事,要求干部既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又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在风险易发多发期,真正过硬的政绩不是“大干快上”的冒进,而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前提下的稳健发展;不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急功近利,而是久久为功、循序渐进的历史耐心。学习教育要让干部懂得:面对复杂局面,最大的政绩是保持战略定力,最大的本事是防范化解风险,最大的负责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

四、政治生态的时代课题: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正确政绩观的大敌。一些地方出现“数据注水”“虚假整改”“过度留痕”等问题,根源在于政绩观错位。这些问题不仅浪费资源、贻误发展,更损害党的形象、侵蚀群众信任。当前,党中央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但一些深层次问题仍未根除。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时代意蕴之四,就是以政绩观纠偏为突破口,持续净化政治生态。学习教育

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深刻的作风整治。通过学习教育,引导干部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导向,健全体现正确政绩观的考核评价体系,完善容错纠错和问责机制。让那些真抓实干、默默奉献的干部得到褒奖,让那些弄虚作假、华而不实的干部受到惩戒。这既是政绩观的校正,也是政治生态的修复,更是激励广大干部在新征程上担当作为的重要保障。

五、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要求:锻造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对干部队伍的素质能力、精神状态、政绩取向提出了更高要求。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锻造堪当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关键一环。

这一时代意蕴集中体现为: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之相适应,政绩观

必须超越单一的经济维度,统筹兼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学习教育就是要引导干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既做显功也做潜功,既重当前也重长远,既看发展也看代价,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在正确的政绩观指引下行稳致远。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是一般性的思想教育,而是立足时代变局、回应发展转型、校准价值坐标、应对风险挑战、净化政治生态、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举措。深刻理解这一学习教育的时代意蕴,有助于增强党员干部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广大党员要以此次为契机,把正确政绩观融入灵魂、见诸行动,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数字化驱动乡村治理变革的“金塘范式”

——基于茂名“善治美”平台的实践考察

罗亚女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其效能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与农民的获得感。长期以来,乡村治理面临深刻张力:国家资源持续下沉与治理任务日益繁重,而传统模式受限于信息不对称、动员能力不足,导致“干部人少事多、群众参与不足、服务半径过大”等共性问题。其背后实质是治理结构与治理需求的不匹配。伴随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社会治理,中央政策文件多次部署“数字乡村”建设。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强调发挥信息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支撑作用,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要求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技术下乡的效果或困境,较少深入分析技术与乡村双向互动的过程机制。基于此,本文以茂名市金塘村依托“善治美”平台的数字化实践为案例,探讨数字技术如何嵌入乡土社会并驱动治理变革,提炼可推广的“金塘范式”。

一、分析框架:技术下乡中的“再组织化”机制

既有研究存在两种取向:一是权治逻辑,强调行政力量推动技术自上而下变革乡村;二是自治逻辑,关注乡村自下而上吸纳技术。两者均偏向单向建构,对互动过程分析不足。事实上,新技术应用本质是社会再组织议题。本文借鉴“技术—社会”互构视角,以“再组织化”为核心框架,构建“空间—资源—主体—规则”四要素分析向度:技术下乡通过构建虚拟治理空间、聚合碎片化资源、激活多元主体、重塑治理规则,四要素互动耦合,共同推动乡村治理秩序数字化

转型。

二、案例实践:金塘村“善治美”平台的治理变革

金塘村下辖9个自然村,户籍人口5200余人,长期面临治理任务繁重、干群关系紧张等难题。2023年5月,该村率先试点“粤治美”平台(后统一品牌为“善治美”),获评“五星村庄”及两项省级荣誉。其变革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空间构建:从“物理在场”到“虚拟在场”

传统治理要求物理性在场,数字技术则突破时空限制。金塘村针对外出务工人员多、老人行动不便等实际,将平台功能嵌入移动端,简化流程,提供个性化服务:对老年人采用粤语实时转文字、语音播报紧急信息;对外出人员精准推送村务动态。截至2026年4月,认证村民达2251人,基本实现智能手机用户全覆盖,虚拟治理空间有效构建。

(二)资源整合:从“离散碎片”到“系统聚合”

金塘村从三层整合资源:一是推动网络覆盖提速;二是将党务、村务、财务等数据纳入平台统一管理,“三务公开”累计发布301次,独创性地将村民签字摺指模环节一并公示,保障知情权和监督权;三是通过“广泛宣传、集中培训、逐户教用”,针对老年人开设“指尖课堂”,由村民投票决定平台首页功能,扩大要素聚合面。

(三)主体赋能:从“被动回应”到“主动参与”

“积分制”是核心激励模块,累计积分2.9万份,村民参与环境整治、志愿服务等可兑换生活用品,扭转了“干部干、群众看”的局面。

“村民说事”板块形成“诉求—受理—办理—反馈—评价”闭环,累计办理338件诉求,实现“小事不出村”。“村友圈”成为互助社交空间,累计发布动态6263条;“活动”板块将村组长年度考核交由村民线上投票,倒逼作风转变。

(四)规则重塑:从“关系型/市场型”到“生态型”

传统乡土治理依赖关系亲疏,数字技术强化社会性监督。金塘村通过“三务公开”“大事记”(累计112件)以数据督人查事,弱化关系治理;同时通过“服务日记”(756篇)记录工作明细,拉近干群心理距离,促进开放、包容、协同的生态型治理规则形成。

三、形成机制:技术刚性与社会弹性的互构

数字化治理秩序再造的本质是技术下乡后的再组织化调整,体现技术结构与社会结构的互构。村“两委”作为关键行动者,既是技术适配的催化器,也是社会关系调整的承接者。

(一)技术刚性驱动适应性重组

一是统合逻辑下的资源重组:通过积分制、三务公开等板块归整数据要素,2.9万分记录村民参与,338件闭环诉求彰显资源流动效率。二是联结逻辑下的主体重组:技术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2251名认证村民)、协同化(6263条“村友圈”互动)、精细化(大数据精准赋能)。三是适配逻辑下的需求重组:“村民说事”第一时间收集需求,“邻里代办”实现“办事不出村”,累计办理服务事项29项。

(二)社会弹性促进实践性

“久久为功”是“八项规定”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作风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不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十多年来,党中央持续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攻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刹住“车轮上的腐败”、整治“会所里的歪风”,到持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深化拓展为基层减负工作,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

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稍有松懈就可能反弹回潮。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始

终保持清醒头脑,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持不懈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抓到底。作为党员干部,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以“八项规定”为镜,经常对照检查自己的言行,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徒木立信,久久为功。”我们要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不断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果,让清风正气在新征程上更加充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作者单位:茂名市委党校)

四、结论与启示

金塘村的实践证明,数字化不是乡村治理的“可选项”,而是“必答题”;“善治美”平台不是冷冰冰的工具,而是有温度的服务载体。其经验可提炼为“金塘范式”:一是以问题导向破解“水土不服”;二是以人性化设计跨越“数字鸿沟”;三是以透明化运作重建干群信任;四是以闭环化流程提升治理效能;五是以公益化坚守赢得民心认同。

展望未来,要充分发挥技术红利,需重点把握三对关系:一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基层政府应积极为数字化转型“定调”;二是载体赋能与主体使能的关系,加强技术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三是规则概化与场景细化的关系,立足地区实际探索适合本地的治理模式。唯有如此,才能让数字化真正成为村民“拿在手里的党群服务中心”,成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引擎,让亿万农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单位:茂名市委党校)

徙木立信 久久为功

叶进雄

近日,笔者参加了电白区2025年“两新”组织党组织书记全员轮训培训班。培训班上,传达了党中央有关从严治党的系列文件精神,多位专家学者讲授了有关课程,特别是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张辉以“徙木立信”的典故,深入浅出地进行剖析,令人耳目一新,领会深刻。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八项规定”涵盖了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等方面,切中时

弊,内涵丰富,彰显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正风肃纪、激浊扬清的作风之变。学习了“八项规定”,“徙木立信”的典故非常有启示意义。商鞅变法之初,通过徙木赏金建立起法令必行、取信于民的形象,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亦是如此。它如同一根标杆,立在党风廉政建设的前沿,向全党全社会宣告了党对作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从一顿饭、一张贺卡、一盒月饼等小事小节抓起,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局”,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赢得了党心民心,树立起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良好形象。

“久久为功”是“八项规定”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作风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不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十多年来,党中央持续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攻坚,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从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刹住“车轮上的腐败”、整治“会所里的歪风”,到持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问题,深化拓展为基层减负工作,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

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稍有松懈就可能反弹回潮。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始

终保持清醒头脑,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持不懈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一抓到底。作为党员干部,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要以“八项规定”为镜,经常对照检查自己的言行,不断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徙木立信,久久为功。”我们要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不断巩固拓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成果,让清风正气在新征程上更加充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作者单位:电白区民间文艺家协会)

关于“清明”发源的探索

杨绍精

清明,在二十四节气中兼具自然时序与人文意蕴的特殊意义。它“气清景明,万物皆显”,承载着祭祖扫墓的肃穆传统,又以“天清地明,惠风和畅”的春日盛景,孕育着风雅情致。跨越千年时光,清明在古今的嬗变中,叩问着世俗对“干净”的精神追求。于生死之间、雅俗之余,安顿着人类文化的根脉。

关于清明的源流,最初的不是为了祭扫。唐代以前,寒食节源起于晋文公与介子推传说的节日,古人以“禁火冷食”的习俗,寄托着对火种的敬畏、对先贤的追思。彼时的清明,更多是“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的节气,与寒食节并行于世。唐太宗曾下诏将寒食祭扫纳入官方礼制,而白居易笔下“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的诗句,更是生动描绘出二者相依相融的景象。宋元之后,清明逐渐吸纳寒食节的核心习俗,将祭扫的肃穆与踏春的欢愉融为一体,成为兼具生死之思与自然之趣的节日。这演变过程,不仅是民俗文化的自然整合,更暗含着国人对生命的独特认知——追思逝者,亦要珍惜春光;感念过往,更要拥抱当下。从寒食到清明的礼制沿革,本质上是古人对“慎终追远”与“春日行乐”双重需求的文化调适,也为后世清明文化的多元化埋下伏笔。

在古人清明的记忆里,雅集之乐与祭扫之思并行,共同勾勒出“清明”二字的辽阔意境。除了禁火寒食、祭扫祖坟的庄重,清明还曾涵括上巳节的风雅。三月三上巳之日,古人临河祓禊,以兰草洗濯尘埃,以美酒祭祀春神。青年男女踏歌而行,文人雅士吟诗作赋。这种“祓禊”仪式,绝非简单的春日嬉游,而是古人以“身心干净”呼应“天地清明”的精神实践,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公元353年的兰亭雅集,更是将这份风雅推向极致。在绍兴会稽的茂林修竹间,王羲之邀集四十二位名士,曲水流觞,饮酒赋诗。一篇《兰亭集序》,既写尽“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春日盛景,亦抒发了“死生亦大矣”的生命慨叹。彼时的清明,既有祭扫时“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恭”的伦理坚守,亦有雅集时“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精神自由;既有对逝者的追怀,亦有对生者的期许。这种“一杯敬过往,一杯敬未来”的生命态度,让清明超越了单纯的节日范畴,成为国人精神世界的映照。它在肃穆中见

温情,于自由中寻安顿。古之清明,是伦理与审美的统一,是天地人心交融的文化范本。

步入现代社会,清明的文化图景悄然发生改变,其丰富的精神内核也在悄然流失。言及清明,人们最先想起的,往往是杜牧笔下“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哀愁。山坡岭头,祭扫者摆上三牲祭品,燃香烧纸,对着“灰砂土”或草墓喃喃细语。那份对先人的思念,在袅袅青烟中显得格外绵长。诚然,祭扫作为清明的核心习俗,依然维系着家族的血脉传承,更传递着世代相承的伦理纽带。与此同时,清明曾经拥有的风雅意趣,却在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中逐渐褪色。如今,彩虹都躲进了雪域高原,或千年湖畔的洁净之地,正如那些被遗忘的清明风雅,只能在古籍的字里行间,寻觅它曾经的模样。现代清明的“仪式化”倾向,恰恰折射出今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偏差——将清明窄化为“祭扫之日”,却遗忘了它更是“生命觉醒之时”。

古今清明对比,是人文与民俗精神的对话。古人眼中的清明,首先是对自然的敬畏:桐花万里,虹影横空,万物复苏。其二是仪式的庄重:祓禊洗尘,焚香祭祖。其三是心灵的省醒:于雅集中体悟生命自由,于祭扫中坚守伦理初心。儒道相融的中和之美,让人心在生死之间寻得平衡。现代人对清明的理解,正从祭扫的肃穆到人文内涵的延伸。它从对先人的追思,对过往的缅怀,真正扩展到人类渴求社会清明。真正的清明,始于人心的纯净。

“清明”二字,内涵广阔,足以安顿世界与人心。它提醒着人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应守住那份对自然的敬畏、坚守传统。在清明时节,不妨暂且放下尘世的浮躁,去听听春风拂柳,去想想兰亭雅集的风雅,聆听大自然的声音,感悟人生的真谛。在古今交汇的清明节日里,且寻得一份清明、明亮的内心,让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记忆,真正成为滋养当代人灵魂的精神沃土。